

# 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动力研究

## ——基于文化视角

张军谋<sup>1,2</sup> 周晓唯<sup>1</sup> 谢攀<sup>1,3</sup>

(1.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2. 兰州文理学院 旅游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3.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摘要:** 在对经济制度变迁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 从文化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的原因、来源和作用方式。1) 基于民族文化形成的民族集体认知模式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动力, 通过一般动力的作用, 可以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地域性的经济制度, 这些秩序化的经济规则有助于降低民族经济活动不稳定性预期, 但因为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之间本身充满了矛盾和张力, 这一作用过程没有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外部适应性。2) 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术)存量增加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创新动力, 但受民族文化结构中人文和科技的结构失衡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在创新选择中对知识(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的认定与把握有所不足, 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受民族文化自我创新驱动的作用不明显,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制度创新多数属于“搭便车”现象。

**关键词:** 民族经济; 制度变迁; 非正式制度; 文化视角; 少数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 (2019) 02-0172-09

从学科领域来说, 少数民族经济与其他经济类型有所不同, 包括民族学 and 经济学两个领域, 具有“民族”和“经济”双重属性和特定内涵。少数民族群体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以及在特定经济体系中所处地位和关系的差异, 其经济活动常常呈现出与主流经济不同的经济类型、经济行为、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单纯从经济学的统计数据中寻找少数民族经济增长率或其对国民经济、区域经济的贡献度, 那么数理模型背后会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变迁理论构建, 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 无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是否获得了增长, 最终都有可能脱离现实的民族社会问题, 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陷入工具理性研究带来的“制度陷阱”。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经济重大转型期,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还依然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 在少数民族经济

发展过程中, 无论是资源配置、利益分配, 还是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政府在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考虑下通过有关制度具体实施的, 如果这些具体制度所持有的规范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较大, 则会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影响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绩效。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经济制度本身可以被视为是经济活动中的一种组织、规则或文化<sup>[1]</sup>。根据我国国情,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构成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宏观环境, 文中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就是指在这一宏观经济制度环境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模式和制度安排; 相应地, 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是指由国家建立和维护, 有利于国家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而确认或形成

**收稿日期:** 2019-01-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16CJL011); 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2016CBY008); 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 张军谋(1976-), 男, 陕西西安人,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从事国民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研究。

的各种有关经济问题的规则和措施的总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具有明显的国家属性，其基本作用就是国家通过这些具体制度的实施向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一系列具有民族经济发展特定指向和内涵的秩序规则，用以界定少数民族经济活动的选择空间，规范经济秩序，约束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稳定人们的预期，提高经济绩效，帮助少数民族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和决策。出于研究的需要，文中所使用的文化概念特指狭义上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不包含物质文化。

在社会转型和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随着民族文化对民族集体认知模式培育共同价值观功能的增强，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明显<sup>①</sup>。在当前发展的经济环境中，从民族文化视角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制度变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重视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有利于把握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体制影响的特殊作用过程和表现方式，从而为少数民族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指导和依据。

## 一、研究回顾与理论基础

### (一) 经济制度与文化关系研究理论溯源

亚当·斯密从特定的“经济人”出发，指出任何一种市场经济，只有在共享道德观（即信守承诺、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运行。斯密非常重视教育和宗教对塑造具有新价值观“经济人”的作用，斯密的观点说明特定的文化观念是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穆勒与斯密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各国的经济状况取决于人们的道德和心理，从而依赖于各种制度、关系以及人类的本性。他在研究中指出：对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和价值来说，其道德品质与智力同等重要。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直接指出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理想）因素和经济动机同样决定着人们的行为<sup>[2]</sup>。这些早期的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经济活动

领域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人，在论述经济发展条件时，文化成为他们不可回避的考量因素，而具有“新文化”和价值的人成为他们研究经济的主要对象。在他们看来，正是特定的文化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而造就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更倾向于承认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作用。这与以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为代表的模型学派（其倡导了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观点有所不同，模型学派更倾向于社会经济增长或发展是由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与文化或制度安排的关系不大。即便以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结构理论”为代表的结构学派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阶段学派虽然意识到经济发展和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并不认为文化或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总的说来，20世纪80年代前，虽然也有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还是强调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文化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然而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历史学派曾基于历史进程的差异性对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随后的边际学派把价值判断引入到经济分析的事实中，作为经济学核心的价值理论便遭遇了文化差异问题。面临自由市场的挑战，凯恩斯学派把制度要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同样直面了经济文化表达的特殊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原因更是没有囿于以前的经济增长研究模式，把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引入经济史的研究中，而且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是制度创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在科斯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构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一种根植于文化因素的制度类型，它通过价值观、态度、习惯等影响人们对制度行为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诺斯在其研究框架里就明确指出经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济制度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及资本存量、产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sup>[3]</sup>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经济制度变迁就是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或文化）共

<sup>①</sup> 历史唯物主义所指经济基础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之间的关系”“分配关系”三个方面，但这一理论研究的前提是阶级社会，本文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中，认为经济基础指涉对象还应包含“基础”一词普世性（或普遍性）的意义，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产业结构、劳资关系等经济综合实力。

同作用下使经济活动中实施合约的交易费用降低而经济绩效提高的结果<sup>[11][32]</sup>。

当然,在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之前,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学派已经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对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相关研究,此时虽然没有对制度变迁进行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对经济制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说明,但这一时期历史唯物主义学派对经济制度范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制度体系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制度分析的一般框架。在今天看来,这种制度分析框架虽然没有具体指明生产力、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制度之间究竟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但却阐明了人类社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经济制度产生的根源、结构、运行特点和规律,形成了适应制度变迁研究需要的宏大分析框架,成为制度变迁历史文化视角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关于经济制度变迁动力来自于交易费用的观点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学派认为促进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制度变革的动力主要是生产力发展引致的结果。

## (二)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经济体制变革的基本历程与现状

自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学者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建设问题公开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杜发春以广西扶绥县壮族地区为例,对这一地区商品生产、交换和市场培育进行了初步研究<sup>[4]</sup>;张克武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现实困难,从思想认识、产业结构调整、对外开放、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变革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思路<sup>[5]</sup>;马玉祥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民族经济立法的重要性和根本任务<sup>[6]</sup>;严天华从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方面对贵州民族地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行了研究<sup>[7]</sup>。这些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的培育和机制的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论述,初步勾勒出少数民族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基本框架。2000年以后,我国

学者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置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国家新经济发展战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这一更为广阔的经济背景中进行审视,得出很多富有见地的结论。如石培基通过对甘、川、青交接区域民族经济的区际联系的全面分析,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使这一区域参与到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循环圈中,而不是被看成是一个生存地带或扶贫区的观点<sup>[8]</sup>;郝时远从市场竞争、人才竞争、制度化水平、生态环境方面论证了我国加入WTO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明确指出在WTO规则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市场压力、利益冲突、人才流失、现有制度政策难以为继、生态破坏等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sup>[9]</sup>;张磊在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总结得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结论<sup>[10]</sup>。

这一时期,在区域宏观经济制度变迁方面,国内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制度和城市经济制度领域,严格意义上讲,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从民族文化视角进行分析文献更加匮乏。在可考的相关文献资料中,费孝通最早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民族文化”联结起来,并且具体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sup>[11]</sup>。陈庆德引入西方经济人类学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出民族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重点在于“工业化后发展民族的经济成长问题”,他分析了经济制度发展理论与民族经济成长、区域经济体与民族经济体、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民族同化和民族经济成长要素等问题,试图进一步密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和民族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sup>[12]</sup>。温军等对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历史演变进程进行了实证考察,梳理了我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发展脉络,并总结了不同时期民族经济政策的发展特点和实施效果<sup>[13]</sup>。黄健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创新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制度创新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创新和民族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领域非正式制度创新两个方面<sup>[14]</sup>;张冬梅指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不能忽视与民族文化的良性互动,并从

就业政策、科技人才政策、文化产业政策三方面论证了经济政策的完善与提高民族经济效率的关系<sup>[15]</sup>。马琴指出民族文化变革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革的先导，同时少数民族经济现代化变革对民族文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sup>[16]</sup>。李先伦等从文化视角指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给出了完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制度政策的指导性建议<sup>[17]</sup>。

综上所述，对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问题，国内学者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研究模式，他们已经意识到经济的工具理性存在着反生产性、破坏性和盲目性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于是从经济的价值理性出发，通过对两种价值观的相互协调和渗透，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发展问题，并把少数民族文化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视为一种动态的历史变化过程，从历史文化维度解析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所引发的经济活动规则体系变化的具体内涵，反映少数民族经济规则体系变迁的潜在过程，这种视角构成了当前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经济秩序关系的文化影响研究模式。

## 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动力的文化影响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理论常把文化当作意识形态来剖析，所以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也倾向于把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当做文化的经济功能来看待。但事实证明，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文化不仅作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整合一个社会的经济价值、经济思想、经济伦理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时文化还能通过自身的发展创新机制带动对经济关系的再调整，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具体经济制度安排的改造和升级。一般情况下，民族文化通过不断地演变和积累首先形成一系列支持性的民族社会结构，如宗教、教育、观念体系、制度体系等，形成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民族文化在维护社会统一、稳定、发展的目标下，按照一种居于统治地位民族意识形态提供的价值系统及文化实践模式，沿着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和生产力

作用两个维度对社会经济资源展开整合。在文化的影响下，经济制度如同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过滤器”，可以与资本、人力、技术等经济发展因素共同内化于生产函数，形成制度经济绩效下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具体而言，民族文化通过一般动力和创新动力两种动力类型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形成对少数民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外部性适应影响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秩序关系发生变迁。本文关于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影响分析正是基于这两个维度上展开的。

### （一）一般动力分析

1. 一般动力产生的原因及来源。经济增长方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观念相联系，从文化角度看，一个民族拥有什么样的经济文化意识和发展观念，对这个民族的经济制度安排来说至关重要。在民族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民族集体认知模式，本身具有意识能动性，这种认知模式通过民族共同体的集体经验作用于民族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形成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秩序关系最重要的特征，这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动力。民族文化是对少数民族社会生产生活做出的客观反映，是民族生产生活历史积淀的结果，具有特定的历史个性及价值取向，这种个性与价值取向基于民族文化结构构成及功能表征的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全面反映着不同地域民族的性格、行为观念、生活方式，体现出人们由经济生产和生活所决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内容。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基于民族文化形成的民族集体认知模式会不断地对民族经济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并指导其方向，并以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的形式实现着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秩序趋于系统化、规范化，这种民族文化对经济秩序的阐释性接受和融合成为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力量来源。

2. 一般动力的作用方式。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集体认知模式具有明显的自组织性，它通过各种生产生活习惯自发地使少数民族的各种经济行为沿着一定的社会规范前进，或人们以民族文化规范自发地采取经济行动，从而形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秩序外在形式的“非正式制度”<sup>[18]</sup>。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这些“非正式

制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内建构力量发挥作用,使人们对自身或他人的经济行为在民族语境下产生某种预期的精神状态,从而导致对个人的某一类经济行为形成有效限制,即形成民族地区的经济行为秩序规范,例如伊斯兰教鼓励勤奋经商、严禁暴利,互惠互利,反对垄断,严禁投机等带有宗教性的商业道德规范。由于规范化的经济行为易于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公平观的共同信念,而共同信念会克服少数民族社会的无序状态,促使少数民族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有效降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协调以及制度维护的成本,从这一点来说,规范化的经济行为决定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实施的效率。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制度的选择不仅必须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而且应当建立在道德和政治的基础上。”<sup>[19]</sup>

在少数民族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适应总是处于一种博弈状态,只有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价值形成预期的兼容,才能实现经济关系与民族文化发展的最佳均衡。少数民族由于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条件的限制,其集体认知模式常常对经济现象仅做经验层面怀疑,缺少理性思考,少数民族的价值确认标准也常常建立在先验性的经济文化传统和经济行为模式的合理性及规范性上,所以一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主体直觉上确认新的经济制度偏离传统的价值轨道,便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抗拒、排斥意识,这从根本上限定了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的开放程度、发展走向和变迁的幅度。例如2016年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在随机选择的调研对象中,问题一问及“寨老比村委会、乡政府、派出所或法院更重要吗?”在调查的500人之中,有278人持肯定态度,占55.6%;问题二问及“出现债务纠纷时,如果法院判决后有拒不执行的情况发生,您首先会选择什么方式进行解决?在给出的四个答案中A.款约<sup>①</sup>;B.中间人调解;C.继续上诉法院;D.放弃。有201人选择A,105人选择B,两者合计占61.2%。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正是这种传统的

文化认知模式促成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中非正式制度与国家正式制度并行,甚至在某些风俗习惯方面还优先于国家正式制度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西藏地区,涉及“赔命价”“赔血价”的案件中,当前大约有60%左右的案件出现对司法结果不予执行而依赖藏族自己习惯法解决问题的现象。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民族集体认知模式的相对独立性也常会使它表现出脱离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基础的倾向,有时甚至是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也不会立即在民族文化中体现。在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前沿知识、专利技术和核心技术发明创造构成了区域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因素,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活动的高度组织化和复杂化,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员的素质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民族文化的传统发展模式,这些经济发展要素并不活跃,这种现状导致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集体认知模式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少数民族地区具体的经济制度安排与民族发展理念的冲突使少数民族经济体的外部适应能力始终难以得到释放。

## (二) 创新动力分析

1. 创新动力产生的原因及来源。20世纪初期,熊彼特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一般情况下,影响经济制度创新的因素很多,如政府的政策偏好、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权力结构等<sup>[20]</sup>。由于管理创新能形成更高效的组织管理模式,而技术创新成果又能够物化为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所以创新发展模式会通过提高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活动沿着创新经济的路径实现制度体系相应变化。从文化影响角度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创新动力源于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术)存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在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存量增加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秩序会通过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

① “款”是侗语的基本词汇,它在侗语中最初含义是连片的、联盟的、有血缘联系的,侗族款组织的“款”就是“联成片的、联盟的、聚集的组织”。“款约法”是侗族地区侗族组织制定的规章约法的款词,是维护各款区社会生产秩序的共同规约,侗族款众也叫它为“款约”。

高实现优化。

2. 创新动力的作用方式。创新动力的作用通常是动态的、复杂的。从民族文化视角,民族文化的结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文化元素的排列组合秩序或构架关系,民族文化结构在塑造民族文化身份的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对生产力的接受方式,包括对生产方式及其关系的稳定性安排。从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术)存量增加到民族文化适应,再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它们之间要维持一种彼此协调的关系,就要求有相应的社会文化结构与之适应。总体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基本由宗教文化、政治文化、伦理文化、生产文化、艺术文化等部分组成,在民族文化构成体系中,学术文化、科技文化和法治文化发育不充分。在构成关系上民族文化形成了宗教文化主导、政治文化支撑、伦理文化影响的格局。整个民族文化中,政治、宗教、伦理文化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文化背景处于社会显性价值的中枢地位,体现着精神至上的价值倾向,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文化则处于附庸和隐性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民族文化结构体系中人文和科技具有不对等的地位和关系,民族文化的人文性要远大于科技性,两者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地位关系加剧了彼此的矛盾,造成了民族文化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科技认识论的冲突,这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创新动力的形成和发挥带来了制约和限制。在科技尚未形成或发展壮大阶段,这种文化构成对促进民族社会统一和发展有积极作用,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已经转变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总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民族文化结构中人文和科技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民族主体寻找、获取、学习和整合知识(技术)的能力都有所不足,继而造成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在创新选择中对知识(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的认定与把握有所不足,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很难通过民族文化机制将知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合到一起,也很难通过知识(技术)创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很多情况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主要就是民族文化结构中文化与科技关系和地位的长期失衡,限制了经济制度创新能力的发挥和对市场的把握。

一般情况下,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中,创新动力的形成是通过民族文化教育功能来实现的。由于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少数民族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可以起到增加民族文化知识和技能、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认识水平等作用,起到激励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秩序不断更新和完善的作用。但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投资、教育激励机制等方面与现代教育发展要求相比存在某些不适应性,造成少数民族地区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术)存量增加形成的自主创新能力较低,然而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多数情况下会受其他相关地区经济创新活动外溢效应的影响,少数民族常常会通过无需支付成本的“搭便车”行为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形成,创新增长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创新驱动过程中,经济制度变迁主要沿着两条路径推进:一是创新通过促进知识(技术)进步形成内生增长机制,推动少数民族经济产业体系知识(技术)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内生型增长机制下的经济制度变革。例如当前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三农、知识扶贫、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在这种路径下,创新会显著正向调节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使经济活动的边际成本下降引起相对价格变化拉动需求,促进收益递增;另一条路径是创新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实现集聚型增长模式下的经济组织制度变革。在这种路径下,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技术)溢出的局域性与根植性所导致的经济效率空间衰减性会促使少数民族经济组织及产业要素形成集聚状态,创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会大大降低少数民族经济组织结构体系内在的分散性与不稳定性,并形成一种集群式创新网络发展模式,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创新绩效的提高,如当前内蒙古自治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类农工贸、林工贸、牧工贸等一体化经济合作经营组织制度,便是通过组织创新将松散的经济行业关系整合成为更加稳定的经济组织体现。显而易见,在这种创新环境中,因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不是依赖民族文化事业进步形成的自我创新机制,所

以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创新动力作用机制面临不可持续的挑战。

### 三、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动力优化

#### (一) 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

在当代,文化已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有些文化(例如科技文化、教育文化、人才文化)本身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代名词。但民族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和形式与社会发展还不相适应,特别是民族文化缺少对少数民族经济的自我创新驱动作用。这种现状造成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布局中,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中制度供给与实施的矛盾,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制度的供给和实施一直都不得围绕初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总是或多或少的受到民族传统的牵绊。例如在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然很难在市场交易中发展出有效的现代交易行为,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本身就缺乏一种可以规范人们交易行为的市场文化体系。在少数民族地区,许多新制度安排要经过多次试用、多次试错、反复博弈,构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巨大的滞后成本,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供给的矛盾愈加突出,极大地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速度和绩效。所以,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自主创新能力将会从根本上使民族文化形成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

#### (二) 实现地区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协同演进

从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联结体存在特征来看,少数民族经济具有鲜明的经济、文化二重性。一方面,少数民族经济聚焦的是财富生产与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经济聚焦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所引发的民族社会问题。这一点更符合政治经济学学科构成的重心——“对历史的分析,对社会整体性的理解,对道德哲学、社会价值及理想的社会秩序研究,以及对社会介入和社会实践的论述。”<sup>[1]</sup>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是配套的,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对于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规律也是建设少数民族社会精神文明,构建民族

和谐社会的客观依据。基于少数民族经济这种鲜明的文化经济二重性,在我国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具体的经济制度安排上,要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体制变革因素考虑进去,特别是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少数民族所在区域经济制度区别开来,确保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系统的、渗透着民族文化发展的经济制度安排,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协同演进。

#### (三) 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实现新的均衡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文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代科技和文化理念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普及也改变着民族文化的传播方式,各民族人口更加频繁的流动迁徙,加深了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联系,这些变化使少数民族原有文化秩序中的时空意义发生了巨大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结构和边际的调整可以扩展少数民族对经济活动自由选择 and 自主决定的认知空间,使少数民族在参与当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创新动力和平等选择权利,增强经济意识、积累发展经验。通过这些渐进和连续的文化影响过程,这些因素会逐步转化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在这些社会资本的共同作用下,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会实现新的均衡关系,从而达到制度变迁效率和少数民族个人与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幸福)。

#### (四) 实施辅助性经济政策,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绩效的提高

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制度发展环境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受封闭市场和自身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还处于不完全市场和信息不充分状态,其交易成本较高,行动主体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不完全且多种多样,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长期锁定在低效率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多年来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实施了一系列辅助性经济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也充分享受到这种制度和政策带来的优惠,但少数民族通常受因循守旧、小富即安等传统文化观念影响,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具体制度安排和政策贯彻的“路径依赖”现象比较严重。“路径依赖”在维护少数民族稳定、促进民族社会民生发展等民族社会治理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反馈机制,但这一过

程会阻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新,不可一概而论。由此可见,由于受民族文化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种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不同文化体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中,少数民族从文化观念上主动适应充分竞争和信息对称条件下的市场文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各种具体制度安排才将会是有效的,其收益也才能最大化。在这种情形下,一系列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秩序将会收敛于一个平衡增长路径,最大化代表家庭福利的竞争性均衡也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帕累托最优。

#### 四、总结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在本质上是对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实际是一个社会对特定制度安排再生产的支付能力,文化只是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任何夸大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至文化决定经济制度的观点都是不恰当的。因此在现实的少数民族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只有当少数民族地区在整体上比较富裕时,才可能有更多的财力配置在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少数民族群众才能有较好的受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少数民族群体也才会更愿意提高参与市场的能力,提高社会人力资本水平,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技术进步和创新,满足现代产业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从而对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个体福利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而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少数民族社会最大的利益就是少数民族劳动者提高了自身的文化觉悟和能力<sup>[22]</sup>。因为“有教育和有知识的人,要比没有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和更守秩序。”这对于国家和少数民族社会来说“可是受益不浅”<sup>[23]</sup>。在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少数民族经济体制改革承载的功能更多,目标更加多元,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具体制度安排应该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约束条件下“折中”的结果,并且在不断的“试错”中推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只有这样,少数民族经济增长过程中现实的价值失衡与矛盾冲突才能从制度层面得到有效均衡和化解。

#### 参考文献

- [1] 道格拉斯 C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2]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宇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39.
- [3] 道格拉斯 C 诺斯.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M]. 厉以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227.
- [4] 杜发春. 市场: 民族经济发展的中枢——广西扶绥县市场建设与发展的调查[J]. 民族研究, 1993 (6): 28-32.
- [5] 张克武.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地区建设[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2): 13-21.
- [6] 马玉祥. 市场经济下条件的民族经济立法——全新的政策思想和法制系统工程[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2): 67-73.
- [7] 严天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贵州民族经济发展思考[J]. 贵州民族研究, 1997 (3): 30-34.
- [8] 石培基. 甘、川、青交接区域区际联系与民族经济社会开放开发研究[J]. 民族研究, 2000 (3): 97-110.
- [9] 郝时远. 加入 WTO 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J].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3 (1): 38.
- [10] 张磊.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 70-77.
- [11]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G].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8: 217-220.
- [12] 陈庆德. 民族经济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4.
- [13] 温军. 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与评价[J]. 民族研究, 1998 (6): 13-26.



- [14] 黄健英. 论制度创新与民族经济发展[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4): 56-61.
- [15] 张冬梅. 基于民族文化的民族经济发展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6): 23-26.
- [16] 马琴. 民族文化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导引——以古丈县断龙山乡田家洞村土家族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14 (6): 125-128.
- [17] 李先伦, 金一兰, 张海伟. 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与旅游产业互动发展研究[J]. 经济纵横, 2016 (12): 35-38.
- [18] 王跃生. 文化、传统与经济制度变迁——非正式约束理论与俄罗斯实例检验[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2): 43-52.
- [19]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0.
- [20] 辛本禄. 权力结构变化与经济制度创新——基于历史视角的分析[J]. 河北学刊, 2012 (5): 136-139.
- [21] 文森特·莫斯科. 传播: 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M]. 胡正荣,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17.
- [22] 王怡, 周晓唯. 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6): 53-60.
- [23]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4: 340-345.

## Impetuses of Economic System Changes in Minority Areas in China's Market Reform: Based on Cultural Perspective

ZHANG Jun-mou<sup>1,2</sup> ZHOU Xiao-wei<sup>1</sup> XIE Pan<sup>1,3</sup>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2. School of Tour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3. Center for Macroeconomic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economic system chan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sources and modes of the impetuse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changes in China's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Firstly, the ethnic collective cognition model built on ethnic culture is the general impetus for the economic system changes, which can motivate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s. These orderly economic rules can reduce the instability of ethnic economic activities, but due to the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between ethnic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ies, this process does not improve the external adaptability of the economic system. Secondly,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increase of knowledge (technology) stocks are the innovative impetus of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influenced by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thnic cultural structures, the ability of these areas to recognize and grasp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of innovation is insufficient. Thus, the role of ethnic cultural self-innovation in driving economic system changes in these areas are not apparent and most of the innovations are made by "hitchhiking".

**Keywords:** ethnic economy; system change; informal system; cultural perspective; minority area

(责任编辑: 贾 宜)